



#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欧洲“古典历史”辨伪

董并生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欧洲“古典历史”辨伪

董并生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 / 董并生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203-09037-3

I. ①虚… II. ①董… III. ①文化史—研究—古希腊  
IV. ①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8764 号

---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

著 者：董并生

责任编辑：王新斐

装帧设计：谢 成

---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mail：[sxskcb@163.com](mailto: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mailto: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cb.com](http://www.sxskcb.com)

---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720mm×1010mm 1/16

印 张：34.25

字 数：630 千字

印 数：1—3000 册

版 次：2015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9037-3

定 价：6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序言 “文明”的唯一性

林 鹏

西方在海外扩张的历史大约经历了五百年。由起初欧洲列强轮番兴起的时代,到英、法、德争霸,经过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超级大国间冷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时期。其间,从大约 17 世纪 70 年代到 18 世纪 70 年代的 100 年间,逐渐形成了西方扩张主义的理论基础——“欧洲中心主义”,而“欧洲中心主义”则建立在西方的“古典历史观”,即“希腊主义”基础之上。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承受来自西方扩张主义的压力,由外部世界的侵入,引发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剧烈震荡。其间,中国文化逐渐从抵御西学的“夷夏之辨”,退守到“中体西用”,几乎要被“全盘西化”。

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向西运动”。“西”者,“西学”也,无论“民主”还是“科学”,无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西学”的表现形式。而“西学”实际上也植根于“希腊主义”。

我们发现,“西学”在起源过程中大量引进了来源于中国文化的内容。例如,最初出现于法语中的“文明”(Civilisation)概念就来源于中国文化。

现代学术界将“文字”的出现,作为衡量“文明”产生的核心标准。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易·文言》:“天下文明”是其用例。“文”指“文字”,指“斯文”。“斯文”者,自尧、舜、禹,经汤、文王、周公至孔子的文化传统之谓也。“明”指“昌明”,“斯文”因“文字”而“昌明”于“天下”就是“天下文明”的含义。这也是“文明”一词的本来意义。

在欧洲,“文明”(Civilisation)一词出现于 18 世纪中期的法语中,最早由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财政部长安内-罗贝尔-雅克·杜尔哥 (Anne-Robert-Jacques Turgot) 使用。法国在 17、18 世纪时为在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路易十五被称为“中国的皇帝”,法国自诩为“文明”的传教士。



杜尔哥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与源于中国的法国经济学“重农学派”成员广泛接触，可以说“文明”一词最早由杜尔哥使用，绝非偶然。

欧洲“文明”(Civilisation)概念来自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说的是孔子的“斯文”照亮了历史。孔子的斯文传统不仅照亮了中国历史，孔子的理性观念也照亮了欧洲大陆，所谓欧洲“启蒙运动”是也。“启蒙运动”者，以孔子“理性之光”照亮黑暗的“神权欧洲”之谓也。

“文字”指书面语言系统，完整的文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汉字就是这样一种“文字”，而且是全世界唯一一种起源于上古的、原生的，至今依然在使用的“文字”。西方诸语言的书面记录是一种被称为“拼音字母”的形式，不具备“字形”要素，在“音声”中寻“意义”，算不上是完整形态的“文字”。加以欧洲历史上使用纸张时间甚晚，之前缺乏书面语言的载体，因而到 18 世纪末才有了“文明”(Civilisation)的概念。

此外，我认为“文明”还有另一个标准。

“文明”的“文”是“文字”的“文”，这个毫无疑问。另外，中国还有一个概念，叫作“文以载道”，光有“文字”没有“载道”不行。除了有“文字”，还必须看使用该“文字”记载了怎样的“文献”。

举例来说，埃及“象形文字”其实是图画文字，里面“载”了什么“道”呢？西方学者说发现了古埃及的《死者之书》。然而，遗憾的是《死者之书》非但没有“载道”，且是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本书；该书是 19 世纪德国一位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卡尔·理查·列卜修斯(1810—1844)编造出来的。再如西亚地区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等。这类“文书”中根本没有类似中国古代群经、诸子、史籍等各类文献的内容。换句话说，用“文以载道”的标准来衡量，找不到“道”的影子。没有“载道”就谈不上“文明”。

对古埃及象形文字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的“释读”，是西方学者们在 19 世纪开始的。与其说是“释读”，不如说是“破译”，或者毋宁说是“猜谜”，而找到破译这些文字“钥匙”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学者，大多是些二三十岁的愣头青。

法国人商博良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第一人，当时 32 岁(1822)，“破译”方法为“猜谜”；首位“破译”西亚楔形文字的人是德国人，名叫格罗特芬德，当时 27 岁(1802)；而英国人罗林森 25 岁(1835)时又一次独立“破译”了楔形文字。商博良开始研究古埃及学时据说是年仅 11 岁的儿童。整个学术界对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位法国小伙子“猜谜”的基础之上。格罗特芬德是德国



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据传有一次打赌说他能够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然后琢磨一下就“破译”出来了。罗林森既不是学者,也不是教授,当时只是一名被派往波斯的英国年轻军官,出于一时的兴趣就轻而易举地“破译”了古波斯与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并将其译文及论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世纪这两位欧洲青年,在文字学“形、音、义”三要素中,只顾及字音,模拟假定“音值”,通过与伪书《希罗多德历史》中若干人名的发音进行比对,用“破译”或“猜谜”的方法,将消失了千年,乃至几千年的三种古代语言或方言准确无误地完全揭示出来,形成了近代西方的“东方学”基础。然而,以中国学术的标准来衡量,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东方学”可信度甚低;同时,《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是西方早期“东方主义”的刊物,是为英国殖民政策服务的工具,缺乏学术性,不足为凭。其实,在17世纪也曾有过类似方法,不过“破译”对象为“神秘”的汉字。如柏林一位学者缪勒(Andreas Müller)声称于1667年11月18日发明了所谓的“中文之钥”(Clavis Sinica),运用他的“方法”,可以非常方便地掌握汉字。当时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相信他的大有人在,包括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假设汉字是一种灭绝了的文字,想来一定可以通过“中文之钥”完全“破译”出来。缪勒生前对其“发现”秘不示人,据说临死前将“中文之钥”及其他手稿都销毁了……

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名叫雅克·德·摩根的法国人于20世纪初(1901年12月)“发现”了一件“世界级文物”,即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该法典碑刻为楔形文字(一种断绝了的古拼音字体),据说距今年限约3700年,使用语言为古巴比伦语(早已失传),释读方法也是“破译”(而非考释),可“释读”比例达百分之百,现代人能够毫无障碍地释读几千年前完全不同语言并且久已失传了的残碑,其中文字3500行,法律条文282条,对刑事、民事、贸易、婚姻、继承、审判制度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从其所“记载”的内容来看竟然是19世纪的观念(概念体系),而且该石碑是反映“古巴比伦文明”经济与社会状况的唯一记录……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领略所谓“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及西亚楔形文字的性质。以考古学常识来说,普通人一看也知道《汉谟拉比法典》是假古董,欧洲学者们硬要将其说成国宝,实在匪夷所思。当代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揭露了西方近代“东方主义”的实质: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19世纪西方学者们通过“编定文本”的方法,虚构了概念化的“东方世界”,目的是为了支配与控制东方世界各民族。“东方历史”在欧洲原来可以被如此这般猜谜、破译、杜撰出来……

15世纪以前欧洲没有文明。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谈到中国的一部长篇小



说时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时候就有这类作品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欧洲的基督教不是原生的“文明”。近代欧洲“文明”是在纸张及印刷术传到欧洲之后才开始的。只有不断更替的不同族群及其所操的不同语言，没有纸张，不能将语言记录下来，如何可能积累文化？没有文化积累的过程，也就不可能有“文明”。

从天下文献源流来说，属于原生的，达到了“文以载道”标准的文明有两支，一支是中华文明，以儒学为代表；另一支是印度文明，以佛教为代表。

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原生的中国典籍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而作为印度文明的代表，以 1193 年最后一座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被伊斯兰军队焚毁为标志，佛教从印度历史上永久消失了。古印度没有统一的民族与语言，佛陀说法使用摩揭陀土语，佛经结集为文字在佛陀身后，据说最初结集使用巴利文，而汉译佛经则大多来自梵文。古印度原文典籍贝叶书很少流传下来；现存佛教典籍，除少量梵文、巴利文残卷外，大部分以汉文译本及藏文译本的形式被完整保存下来。

有人会说，在佛教之前不是有“吠陀文明”吗？事实上，所谓古印度“吠陀文明”是 19 世纪初前后出现的概念，也属于近代西方的“东方主义”范畴。欧洲人在经营印度殖民地过程中，鉴于“古希腊文明”根基浅薄，出于为自己寻觅古老优种“祖先”的需要，虚构“雅利安人入侵”的故事，编造了“印欧语系”的学术谎言。《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的年代无法确定。据说这类文献起初以“口传”方式流传，形成“文字”的历史甚晚。现存《梨俱吠陀》由“天成体”写成，而“天成体”出现于 13 世纪初。说梵文在三千余年前一经出现，就非常完备，至今没有多少变化，显然违反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将《梨俱吠陀》等吠陀文献断定为公元前 15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之间的说法出自殖民主义学者马克斯·缪勒的猜测，并无科学依据；后来找出土耳其波加兹科易 (Boghaz Keui) 等地据说是公元前 14 世纪的某些“泥板文书”，说这些“泥板文书”上有“雅利安”君王的名字，用以支撑马克斯·缪勒的立论。由上文所述欧洲人对西亚“泥板文书”楔形文字的“释读”建立在“猜谜”的基础上，可知其对土耳其“泥板文书”内容的“释读”亦缺乏严肃性，不足凭信。

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规模宏大。试举明代文献数端为例：如由皇家所编《永乐大典》(汇集文献七八千种，正文 22 937 卷、目录 60 卷，分装成 11 095 册)，



佛家的官、私刻《大藏经》(少者 6 300 余卷,多者达 12 600 余卷)<sup>①</sup>,道教的《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计 5 485 卷)<sup>②</sup>等皇皇巨典,不一而足。其他经、史、子、集四部各类文献,各种典章制度,各家诗词、文集,各州道府县地方志等等,数不胜数。这才是真正人类文明的大宗遗产。同时期的欧洲,除了写在羊皮上与《圣经》相关的几页“书册”之外,没见到有什么可称“文献”的东西。

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相接触,表现出来的是像“鉴真渡东海,郑和下西洋”那样传播文化、传播和平的“王道思想”。而以“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打着“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旗号的扩张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是“霸道主义”。今天以“西方扩张主义”为背景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表面看来,如今的“霸道主义”横行天下,不可一世;历史表明,“霸道主义”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可以横行一时,但都好景不长。而以“仁者无敌”理念为基础的“王道思想”则根本不同。“王道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中庸,民本,孝道,仁德,礼让(修养、怀柔、文化),义利之辨,和而不同,成人之美,扶危济困等核心价值观念。

我认为,与“王道思想”相较量,“霸道主义”终将败下阵来。历史的天平向以“仁者无敌”为核心理念的“王道思想”倾斜。换句话说,可以制衡“西方扩张主义”的唯有“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

山西人民出版社于 2015 年出版《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具有特殊意义。从新文化“西向运动”,到传统文化“向东回归”,到 2015 年恰好是 100 周年。经过百年轮回,人们看到一个古老文明从救亡图存,到文化上自我否定;从追逐“四个现代化”,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轮回过程。

值此新文化运动 100 周年之际,本书作者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提出“古希腊文明虚构论”,从源头上系统地揭穿了“西方文化”的假面,揭示出“文艺复兴”以来欧

①以明代官私刻佛教《大藏经》为例。官刻三种:《洪武南藏》[全藏 678 函,收经 1 600 部、7 000 余卷;洪武五年(1372)敕令开刻,至洪武三十一年完成雕版,历时 27 年]、《永乐南藏》[计 636 函,收经 1 610 部、6 331 卷;明成祖敕令雕印,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完成于永乐十五年(1417)]、《永乐北藏》[计 636 函,收经 1 615 部、6 361 余卷;永乐八年(1410)敕令雕印,历时 30 年];私刻一种:《嘉兴藏》(计正藏 210 函,续藏 90 函,又续藏 43 函,2 090 部,12 600 余卷;万历十七年开雕,历时二百余年完成)。

②明代刊刻道教总集有《正统道藏》[计 480 函,5 305 卷;明成祖即位之初敕令编撰,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始行刊版,于正统十年(1445)校定付印]、《万历续道藏》[计 32 函,180 卷;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命第五代天师张国祥续补]。





洲学者们虚构“古希腊文明”过程的大致轮廓,揭露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作者提出,欧洲近代“文明”来源于中国。无论是西方的“科学”,还是“哲学”、“艺术”,其源头都在中国。欧洲在近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为了隐瞒其真实来源,虚构了“古希腊文明”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杜撰了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为其“欧洲中心主义”服务。

本书考述内容尚属初步成果,所提出的论点未必全部成为定论,或者毋宁说本书考述内容是对18世纪下半叶以来“古希腊文明”定论的全面质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人们反思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及五百余年的欧洲历史,彻底解构三百年来的“欧洲中心论”,重新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使命,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20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过全世界二十六种“文明”的生灭,提出了“中华文明救世论”<sup>①</sup>,近年有人据此提出“中国文明的独一无二性”<sup>②</sup>。

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文明的独一无二性”,不如说是“文明的唯一性”;而这唯一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概而言之,“文明”的标准应当是:第一,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项要素;第二,有了文字,还需要“文以载道”,未能“载道”,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第三,既称“文明”,必须照亮历史,唯有“中华文明”曾经照亮历史,并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西方的“东方主义”与“希腊主义”相表里,一并构成“欧洲中心主义”的内核与幔帐。常言道“去伪存真”,佛教云“破邪显正”;在破除虚构的“希腊主义”之际,连同“东方主义”一并剪除,才能廓清迷雾,彻底解构“欧洲中心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完全彰显“中华文明”的光辉。

---

<sup>①</sup>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回答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池田大作所提问题时说:如果有来世,“我愿意生在中国。我觉得,中国今后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得以转世为中国人,我想自己可以做某种有价值的工作。”汤因比进一步补充说:“如果我将来生在中国,要是在那未来的时代,世界还没有融合起来,我就致力于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池田在总结他和汤因比的谈话时提到:“汤因比博士对于中国在广大地域多民族融和、协调,一贯保持一个文明的这种悠久历史刮目相看。他还清晰地论述了中华文明精神遗产的优秀资质,预言今后中国将成为融合全人类的重要核心。”

<sup>②</sup>见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博士刘涛:《汤因比学说与独一无二的中国文明》(2013)。



现在应该到了正本清源,以中华文明“仁者无敌”的“王道思想”为圭臬,为人类和平乃至“天下太平”(平天下)做出贡献的时候了。这正是“中华文明唯一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4年12月于太原东花园



## 前 言

西方“古典历史”是指“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而“古典学”一词则特指从 18 世纪开始以公元前 480 年—公元前 323 年“古希腊”及奥古斯都时期的“古罗马”（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统”。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的“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的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 18 世纪后半叶至 19 世纪期间。18 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的概念，一时间在西方有“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实际上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不仅如此，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概念，本质上也是 19 世纪西方学者们的“创造”，再加上 19 世纪他们以貌似科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并兜售的“古印欧语系”假说，进而以之为基础，建构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

复兴中华文化，不认清西方“古典历史”的本来面目则易为其所惑，落入文化转基因的危险境地。本书试图通过证明“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概念以及“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虚构性，通过揭示“西方学统”的重重疑窦，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

师友林明先生经常对笔者说：“西方其实并无文化，古希腊除了是个地名什么都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历史大多都是后世好事者编造的故事”，“文艺复兴，一个死了上千年的传统，怎么可能说复兴就得以复兴？”为了求证，笔者带着重重疑团，在涉猎西方历史文献及相关史学著作时留意于此，结果发现，林明先生所见非常准确。于是笔者对西方虚构“古典历史”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以期系统揭露西方“古典历史”的虚伪性。

**“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手稿传世**

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



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6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中的一段话。<sup>①</sup>

凯尼恩所指那段话为:“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sup>②</sup>

然而,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唯一“传世”的著作《历史》原来是一部伪书。(详见本书第2章第2节考述)

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其所述内容不足为信。(参见本书第1章相关内容)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莎草纸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sup>③</sup>而羊皮纸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sup>④</sup>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300张羊皮<sup>⑤</sup>,《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5万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5万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300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900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1200张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纸

①见[英]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译本,第10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版下册,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

③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④参看[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5月。

⑤“哥腾堡活字版印刷术发明时,第一套书,就是用欧洲自制纸与羊皮纸印的新约圣经,据说每本用300张小羊皮。”陈大川:《纸由洛阳到罗马》,第98页,财团法人树火纪念纸文化基金会,2013年10月第1版。



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 实际上,羊皮纸不是纸,莎草纸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亚(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sup>①</sup>

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地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黏液,使草片相互黏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sup>②</sup>

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用树皮做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2.54厘米(1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用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上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太平洋岛屿上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sup>③</sup>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②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③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 美国造纸专家的鉴定

“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 及 tapa 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sup>①</sup>

### 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

“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亚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sup>②</sup>

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sup>③</sup>

### 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sup>④</sup>

“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芯草或小植物制成。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纽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sup>⑤</sup>

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湮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 huun 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 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②潘吉星:《中国造纸史》,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③参看孙宝国、郭丹彤:《论纸莎草纸的兴衰及其历史影响》,载《史学集刊》,2005年7月,第3期。

④[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2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⑤[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的过程及历史影响》中译本,第3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被发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 80 年之后，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 1793 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sup>①</sup>，还是古罗马时期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的《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sup>②</sup>

**当代美国科技史权威学者乔治·萨顿认为古希腊人的文字载体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sup>③</sup>

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 17 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参见本书第 3 章第 6 节相关内容)

**古希腊本无文字**

古希腊本无文字，从商业民族腓尼基那里借来了字母，据为己有，形成了“希腊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则来源于古叙利亚语及古埃及象形文字。与其说是“希腊字母”，毋宁说是“闪米特字母”。

“尽管学者们尝试过，他们还是无法忽略以下事实，即希腊字母看起来像闪米特字母，发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数还有相应的名称。如：alpha/ālep(牛)；bēta/bēt(房屋)，等等。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语中有明显的意义，而在希腊语中则没有意义。”<sup>④</sup>

**后世所见古希腊语，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标准希腊语”**

“标准希腊语”，也叫“共通语”，是一种所谓“希腊化时代”的人造语言，流行于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亚、非地区。

“古希腊共通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

①[德]维拉莫威兹：《古典学的历史》中译本第 1 版，第 130 页，三联书店，2008 年 6 月。

②炮制所谓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就是此人。

③[美]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中译本，第 29 页，大象出版社，2010 年 5 月。

④[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 1785—1985》中译本，第 358 页，吉林出版集团，2011 年 7 月。



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sup>①</sup>

### “标准希腊语”得以流传下来，因其为基督教所使用

尽管没有哪一种说法认为基督教起源于希腊，但它们却一致偏爱使用希腊语。“标准希腊语”是传播福音以及早期教会最初使用的语言，新的宗教信仰最初也是在讲希腊语的海外犹太人中间传播。

实际上，犹太人用“标准希腊语”创作《新约》很自然，“标准希腊语”用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借用自腓尼基字母。而且在希腊借用腓尼基字母（公元前 8 世纪中期）之前，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就已经用腓尼基字母进行创作了。

《新约》如此，《旧约》也如此。希腊语的《希伯来圣经》《七十士译本》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圣经版本，并且被犹太人广泛运用于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运动中。

### 所谓“标准希腊语”并非希腊语

后世所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本身也是后世所编的故事。而所谓“希腊字母”，本来名字是“腓尼基字母”，属于西亚文化的范畴，因而西亚人使用“希腊字母”不足为怪。伊朗人用“希腊字母”；大夏语用“希腊字母”；创作《新约》时，犹太人也用“希腊字母”。不仅在亚洲，欧洲人也拿“希腊字母”来标注自己的方言，如高卢（法国）人用“希腊字母”。（详见本书第 4 章第 2 节相关内容）

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很震惊地发现，希伯来语与腓尼基语彼此听得懂，发现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存在大量相似的地方。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不是从迦南语或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可以追溯到闪米特来源……

### 如果真有古希腊语，一定是方言，并没有流传下来

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所谓“古典时代”在希腊半岛所使用的古希腊语是各种不同的方言，并没有流传下来。《荷马史诗》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人工语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古希腊语发音系统是 16 世纪荷兰文学家伊拉斯谟新造的。

据说古希腊地区有 20 种以上的方言。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方言：伊奥尼亚希腊语、爱奥尼亚希腊语、阿尔狄亚—塞浦路斯希腊语及多利希腊语。

<sup>①</sup>[英]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译本，第 260—26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1 月第 1 版。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四种主要的方言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形成的，也不很清楚这种方言的差异与在这个变幻不定时期里许多分散的希腊小社会在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方式有着怎样的关系。”<sup>①</sup>

### 19世纪希腊复古主义败坏了希腊“口语”

“近代希腊语与西方口语很相似，也强调重音，而不强调音节。它还创立了一种相似的重音诗体，即所谓的‘主节律’，与古代希腊韵文迥然不同。近代希腊的重音诗体是11世纪巴西尔二世的史诗——与《罗兰之歌》相似的拜占庭史诗——的载体。但是，如果说11世纪的《罗兰之歌》是西方各种活语言的方言文学之父，其影响经历900年仍长盛不衰，那么，同时代的这首拜占庭史诗却由于东正教世界复兴了古代希腊语言和文学而被阉割，丧失了原本应有的使命。甚至法国和威尼斯口语文学所提供的榜样，也不能刺激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希腊口语文学。”

“希腊文化在东正教世界的复兴发生在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社会发生长期接触之前。19世纪，当希腊东正教徒对西方的态度从蔑视和敌视转变为赞扬和欢迎时，这种文化交流本来可能会把近代希腊语言从僵死的希腊文化幽灵中解放出来。但是，希腊人很不幸地从同一个西方源泉吸收了民族主义的毒汁，结果，19世纪的希腊人更强烈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古希腊语一脉相承，他们祖先的东正教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系使他们乞灵于语言复古主义，硬在自己的母语中塞进大量的古希腊词汇、变音和语法，从而败坏了母语。在语言文学领域，西方文化的特色本来是利用生动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手段，而希腊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接受”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不是解放而是束缚现有的希腊活语言。”<sup>②</sup>

### 莎草片不可能承载古典文献，羊皮卷则为中世纪教会所垄断

在中国纸传入之前，欧洲中世纪用羊皮卷抄录文献，基本上限于基督教会和修道院，除了《旧约》、《新约》及相关内容的书籍之外，很少有其他文献。教会与修道院都是严格禁锢人们思想、排斥异端学说的场所，怎么可能有大量的教士、修女在上千年的时间内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断进行抄写、传承呢？

### 所谓“古希腊手稿”缺乏可信的流传著录

在欧洲中世纪千余年间不见的“古希腊手稿”，于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大量出

①[英]保罗·卡特里奇：《剑桥插图古希腊史》中译本，第55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2月。

②[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中译本，第4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